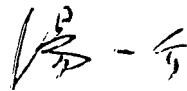


我之珍視《二十一世紀》是因為它能夠堅持學術與思想並重，超越與參與兼顧。超越是指其思想與學術的多元，參與則指其針砭時弊、社會批判與立德建言。筆者久居法國，在寫下以上文字時，腦中自不缺乏法蘭西知識界這一參照系。參與(engagement)是法國思想刊物的傳統，《精神》(Esprit)、《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都是參與的典型。70年代末以來，西方思想界也面臨潮流回蕩，後起的優秀法國人文期刊如《評論》(Commentaire)、《辯論》(Le débat)，一右一左，均是超越與參與並重，這既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治學的要求。希望十年之後的《二十一世紀》更為超越也更多參與。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現職法國國際電台。

## 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



回顧幾十年來，看看我們走過的歷史，眾多的失誤，難道不都是由於聽不進不同意見而造成的嗎？對領導者多一點批評好，還是多一點「歌功頌德」好？領導者多聽一點批評意見好，還是只喜歡別人吹捧好？我想，還是多聽聽批評意見好。今天我們的社會「歌德派」太多了，而像子思這樣的人太少了。甚麼時候多一點子思，而少一點「歌德派」呢？

偶讀湖北荊門出土的郭店竹簡，其中有這樣一條：「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問：『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者，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這是兩千三百多年前的一條竹簡，讀它，我深感經過了兩千三百多年我國的領導者在對待批評上並沒有甚麼進步，似乎反而大大不如魯穆公了。就當前的教育來說，誰不知道我們的教育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們的



領導本來應歡迎大家來批評當前的教育制度、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殊不知，剛剛有學者提出一點比較尖銳的意見，有的領導就受不了啦，據說還要採取甚麼行動。這豈不是連魯穆公都不如了嗎？魯穆公聽了子思的話後，雖然不高興，但並沒有要採取甚麼行動，反而要成孫弋為他解惑。成孫弋的話說出了一個大問題。他認為，像子思這樣的「士」（知識份子）敢於對領導提出批評意見，正因為他們是不追求利祿和爵位（金錢與官職）的，而有些人可以為領導賣死命，但他們為的是得到利祿與爵位。回顧幾十年來，看看我們走過的歷史，眾多的失誤，難道不都是由於聽不進不同意見而造成的嗎？某些領導人不僅聽不進不同意見，反而給提出不同意見的人加上種種罪名，而進行迫害。這樣的歷史教訓還不認真記取，怎麼能領導好我們的國家？不喜歡聽批評意見的領導人，一定喜歡聽那些對他「歌功頌德」的「讚美詩」。可是這些「讚美詩」是一種

腐蝕劑，把那些本來就不怎麼樣的領導者弄得糊裏糊塗，忘乎所以，誤國誤民。對領導者多一點批評好，還是多一點「歌功頌德」好？領導者多聽一點批評意見好，還是只喜歡別人吹捧好？我想，還是多聽聽批評意見好。「恆稱其君之惡者」才是對國家與民族負責任的態度。今天我們的社會「歌德派」太多了，而像子思這樣的人太少了。甚麼時候多一點子思，而少一點「歌德派」呢？也許要等到黃河再變清的時候吧！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 君何國人？

趙敬衡

假定知識份子的主要社會職能是對體制進行文化批判，我就得首先回答一個問題：我面對的是甚麼體制。如果我承認中國的體制可能與西方不同，我就得先問自己一聲：君何國人？我們不可能是，也沒有必要做一個「世界知識份子」。對自己的立場的有限性是否自覺，是知識份子的真正標記。